

#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國際研討會紀要

侯嘉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2015年8月19至21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集多國學者，舉辦「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中共宣讀論文21篇，圍繞近代中日關係進行深入討論。欣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內外紛紛舉辦各類研討會或紀念活動，其中本次會議所展現的共同研究成果與深入對話反思，在諸多會議中仍顯得十分特殊而重要，值得特別注意。

本次會議之源起，係自2012年起中研院主題計畫「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的三年階段成果。此一大型計畫由近史所研究員黃自進總主持，分支計畫主持人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日本及美國等27位學者，希望由近代中日的國家國民型塑、思想文化交流以及經濟競合等三個主軸，探討近代百年間兩國多重且複雜的互動關係。計畫成員均為研究海內外中日關係史的重要學者，其中有9位任教於日本大學院校；5位任職於大陸地區研究機構及大學；另有1位任教於美國大學。除一般的會議及演講外，主題計畫執行期間亦建立資訊交換平臺（<http://mhmsjr.blogspot.tw/>）分享新訊，成員之間亦彼此交流頻繁。值得一提的是計畫成員皆由華人組成，誠如黃自進闡明，深盼藉由此計畫為契機，聯合華人學者互相討論並凝聚共識，從而擴大中文學界在國際學術研究中的話語權。

此前主題計畫成員已分別於2013年及2014年舉行過兩次討論會，已累積了可觀

的研究能量。本次會議宣讀 21 篇論文，事實上可視為是計畫成員三年來的結案成果。而除了主題計畫內的成員外，亦邀請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蔡龍保以及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教授李冬木與會發表論文，增進計畫成員內外部對話討論的機會。會議分為 8 個討論會，依照主題計畫所關注的主軸可大致區分為近代國家的形成與國際關係、中日文化流轉與交相影響，以及近代經濟互動等三大主題分別討論。

首先是關於近代國家形成與國際關係的主軸，此為本次會議最關心的焦點，共有 4 個討論會探討與之相關的各面向議題。「清末政局與日本」的討論會中由岡山大學文學部教授姜克實發表〈犬養毅與辛亥革命〉，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楊典錕發表〈清末軍事改革中的日本軍事顧問和教官：以袁世凱的北洋軍為中心之研究〉組成。姜克實把犬養毅的相關言論、人際網絡等，指出過去認為犬養毅支持革命的認識過於片面，事實上從其關係可以發現立憲派與革命派在日本的活動各擅勝場，甚至形成不同空間集落。楊典錕則從袁世凱的練兵歷程中發現日本顧問的影響力相當重要，雙方的軍事交流甚早，日本軍事顧問扮演了新式軍事觀念傳入中國的媒介角色。自由討論時，姜克實對犬養毅的討論引起多位與會者關心，千葉商業大學商經學部教授趙軍則認為，所謂大亞洲主義者與大陸浪人等其內部亦存在著不同群體，他們在華的活動也多半各具企圖，值得仔細甄別。

延續此一觀點，「日本與早期國共發展」的討論會進一步將多層次關係延續至 1930 年代。首先是黃自進藉由〈日本的兩個面向：孫中山與蔣介石的不同取徑〉討論孫與蔣對日本的想法差異，認為日本對前者而言代表了接受西學之一管道，而對後者而言則是一個學習榜樣；二者的差別，也致使兩代革命領導人有著迥異的日本印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新生與其指導的碩士生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會議海報  
(圖片提供／侯嘉星)

劉彤，則著眼於「東學」的政治思想影響，通過〈留日學生與早期中國共產黨——以施存統為中心〉大量耙梳施存統的言論，指出日本近代興起的各類政治思想，實與中國政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本場次也導論到近代國家、民族國家與國民國家的問題，主持人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劉建輝認為，此一討論或許僅存在於中日詞彙語境下，由此更顯得在近代國家型塑的過程中，日本元素不容忽視。

時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近代中日國際關係與戰爭衝突也是中日關係之一重要面向，會議第二天的「對日決策與外交」與「戰爭與歷史現場」兩場討論會便以此課題為核心。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總合學術院教授劉傑發表的〈中國通外交官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一文，指出撇開中日關係的戰爭線索外，另外有一群外交官群體致力於推動以經濟發展為主的中日關係，藉由對歷任外務大臣及駐華公使的考察，可以發現日本對華外交的共通原則。在同場討論中，大東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鹿錫俊於〈夾縫中的抉擇：蔣介石處理對日對蘇關係的曲折歷程（1931-1935）〉，則通過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對日蘇外交策略的轉變，希望討論中日蘇三國的複雜交錯，亦即在威脅的緩急大小之間當局之決策考量。近史所研究員潘光哲更進一步指出，即使是近代活躍於對華事務的日本「中國通」群體，也存在內部不小差異，值得進一步探究。

另外，關於戰爭的討論，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孫江則嘗試由不同角度看待南京大屠殺，其在本次會議發表的〈痕跡·事件·證言——步兵第三十三聯隊中尉天野鄉三在南京〉一文，嘗試利用三組不同的史料加以考辨對映，希望藉此撇開民族主義影響重新檢視日軍攻占南京之後的行為。趙軍所宣讀的〈墮落為醜陋工具的「提攜」與「共榮」——侵略戰爭與「大亞洲主義」的末路〉，則呼應前一天所討論的大亞洲主義問題，特別此一戰爭爆發前後曾經作為宣傳手段的主張，在戰爭中撕破表面和諧而顯出其侵略或掠奪之目的。同時趙軍也指出，戰前和戰爭初期響應大亞洲主義的人士，往往是中國的精英分子；黃自進在討論時則建議未來應該避免使用「漢奸」一詞，改稱之為「協力者」，藉此更深入思考這些政治或社會菁英與日本合作的複雜因素。近史所兼任研究員朱浚源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兼任副教授邱炫煜共同報告〈中日大戰在緬甸（1942至1945）：文獻探討〉，廣泛蒐羅中英日文有關二戰緬甸戰場的資料，並指出對緬甸戰場的討論，可以注意到中國在二戰中的軍事表現高於一般印象。邱炫煜也提及研究中儘管已經初步蒐集一些有關緬甸戰場的影視資料，但未來對於影視媒介詮釋戰爭的研究應給予更多關注。

大體而言，國家形成與國際關係的主軸雖然是由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與軍事史出發探討中日關係，但仍然注意到過去研究中

忽視或未及反省的面向，也突顯雙方複雜糾葛的關係。不過從發表的文章與討論來看，實際上已注意到在中日關係中極為重要的「西學」與「東學」在近代中國之意義，此亦即本次會議第二個主軸：中日文化流轉與交互影響，共有 3 場討論會、9 篇論文圍繞此一主題。

有關近代中日文化流轉的互動關係，本次會議在第二天「日本與近代中國的學知交流」與第三天「翻譯、知識與中日思想互動」兩場討論會中有深刻的對話。首先在學術文化交流中，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晴佳首先由 18 世紀中葉以來中日學術交互影響，來討近代西學與東學對兩國發揮的作用。其〈清代學術與中日近代史學的不同關聯〉認為日本融合古學與考據學出現的折衷學派，及此後實學的影響，或許提供了西學在東瀛迅速傳播的土壤，在此基礎上經過轉化又傳回中國。劉建輝之〈現代中國文學的日本因緣〉則論證了 19 世紀中葉為因應西學翻譯而在日本產生的漢語復興，實際上這種新漢文形式影響了後來梁啟超所提倡的新文體，乃至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可說是中日雙方思想文化互動的典型例證。不過潘光哲也進一步提醒，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參與者自身立場、新媒介與新交流平台的作用至關重要，在〈吳汝綸與根本通明的易學論爭：清日知識人往來互動之一例〉提出以吳汝綸為例的中日知識菁英，彼此交流的同時實際上仍充滿各類自身的見解，並非白紙一

片，其交流對象亦為錯綜複雜，當慎思其背後脈絡。誠如劉建輝所言，這種交流意味著中日帝國的交叉，清帝國時期日本作為邊緣接受文化；但在 19 世紀末以降日本帝國擴張，反過來加強對中國的影響，二者互為核心與邊緣。

進而言之，從具體的知識翻譯與學科層面來看，這種西學、中學假日本轉化後再反饋回中國的例子更為鮮明。「翻譯、知識與中日思想互動」的討論中更聚焦於在個別學科，李冬木從國民性一詞出發，以〈關於「國民性」一詞及其中日近代思想史當中的相關問題〉為題探究該詞彙的變化，與前一天劉傑輝所言的近代日本漢字復興可以相互印證，顯示西學以漢字為載體在中日兩國發揮的巨大影響。宣讀〈嚴復的譯詞與日本譯詞〉的成城大學經濟學部教授陳力衛，則利用中日詞彙大戰為線索，指出後來日本譯詞壓過嚴復譯詞的現象，恐怕更多是中國自身的雅俗之爭，在渴求新文體的近代中國，來自於日本的譯詞及其夾帶之大量留學生與知識體系，最終左右中國學人對西學的詞彙選擇。長於中日佛學研究的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教授陳繼東，同樣注意中日知識學術的流轉，在其〈章炳麟與明治佛學〉一文中指出，章太炎在日本利用中國考據學方法來考辨《大乘起信論》之真偽，實際上早於日本學者掌握文獻研究與學理分析兩大方法，對近代佛學研究意義重大，亦可窺見中日學術互動的影響。最後近史所副

研究員張哲嘉以〈承淡安的日本訪學與中國新針灸學的建立〉為例，認為承淡安在中國針灸學的地位，與其接受日本以解剖學為基礎改良的現代針灸學有關，並利用「東學中源」的宣傳概念提高新式針灸學接受度。從語言學、文學、佛學以及醫學等各個具體學科，都能看到近代中日關係中交互流轉的文化變遷。

而不可忽視的，近代文化與學術可能有其政治傾向，第三天「東北／滿洲與日滿交流」討論會正是由文化而影響政治的代表。近史所助研究員林志宏發現滿洲國地方志的纂修工作，除了延續士紳參與修纂地方志的文化傳統外，也成為日本當局掌握地方的手段之一，其宣讀的〈滿洲國時期的地方基層社會調查〉一文大量整理滿洲國時期地方志，指出日本統治影響及地方意識萌芽等特點。同樣的近史所副研究員賴毓芝則在〈從圖像消費到文化政治：乾隆朝西清譜錄在晚清民國時期的複製與再生〉中，以西清四鑑為線索，討論清代文物圖鑑之代表著作，經過日本石印及銅板技術再製後，一躍成為晚清民初上海文化商品市場新寵兒，甚至到1942年滿洲國舉辦滿洲國寶展，便特選此套圖譜陳列展示，其中不免有日本技術已具有保存中國文化精隨之宣示意味。從上述此一主軸各篇論文的發現來看，近代中日之間存在互為主從的文化傳遞關係，而文化或學術也不免影響了近代國家的形塑，所以中日關係多重面向的主軸彼此又交引纏繞，相互

闡發。

除了近代國家意識形成以及中日文化流轉兩大主軸之外，另一主軸是近代中日的經濟型塑的課題。在「經濟、貿易與投資」討論會中，近史所研究員陳慈玉從日本對華的特殊投資機構——中日實業公司出發，分析其經營良窳，其〈戰前中日實業公司對華通訊業的投資〉特別聚焦於通信事業，因這是20世紀初期的新興產業，乃日本對華投資之重心，更藉此指出中日實業可說是日本國家資本，通過特殊機構對華投資的典範。本場另外兩篇文章則將焦點放在殖民地臺灣，蔡龍保在〈在臺日本人的土建會社經營之研究——以太田組為例（1896-1945）〉中，認為這些發跡自殖民地的日本企業，有別於跨國性的大公司，其自起自日本而發展於臺灣的種種現代技術與經營經驗，實際上是構成今日臺灣社會重要元素。另一方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藉由〈1930年代臺灣在亞洲內部的貿易與移民〉為切入點，討論臺灣在日本東亞的經濟布局極為重要，是溝通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樞紐，而實際上政治的國界在這些經濟與人群往來中，顯得格外鮮明。從經濟的角度出發，亦同樣可以看到中日關係各個層面之間緊密的互動關係，從而構成斑斕而巨大的圖像。

整體而言，誠如劉建輝在綜合討論中所言，近代中日關係錯綜複雜的故事中，往往沒有誰能一直是主角、誰一直是配角，實際上角色互換頻繁而經緯交織。西學東漸、東

學中源或東學入中等等現象，展現了東學與西學共同影響近代中國的面貌。本次會議討論主題之一的大亞洲主義，是日人希圖在文化、經濟基礎上達成政治目的，然而正是政治上的近代國家建構、文化上的相互流轉遞嬗，以及經濟上的共存共榮乃至相互滲透，以此三大主軸構成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孫江亦指出，多面向意味著具反省與自我批判的能力，近代中日關係，無論對中國或日本而言，都需要跳脫民族主義的限制，從而能實現真正自我省思。在諸多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活動中，本會議希望拋開民族觀點的基本精神十分重要。

恰如陳慈玉所指出，從政治、外交立場

出發能對經濟問題帶來很大啟發。得益於三年來主題計畫的積累，計畫成員在多重面向中的各個領域別有專精，又經過長期溝通與互動，故在會議中每每有引人入勝的深刻對話。特別是前述主題計畫以華人學者為核心，彼此具有共同的語言，林滿紅亦認為這是彼此溝通討論流暢的關鍵。同時她也建議能安排系列演講，除了學界之外也面對社會更廣泛的推廣具多重面向省思的研究結果。對於未來的發展，計畫成員們一致認為這樣長期交流討論幫助極大，期盼能繼續保持團隊對話的管道，甚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納入日韓學者共同討論，創造更為多元的東亞歷史觀點。